

牛李党争

与

中晚唐文学



方坚铭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NIULI DANGZHENG YU ZHONGWANTANG WENXUE





【牛李党争^与 中晚唐文学】

方坚铭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牛李党争与中晚唐文学/方坚铭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6
ISBN 978-7-5004-7651-1

I. 牛… II. 方… III. 古典文学—文学研究—中国—唐代 IV. 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25949 号

策划编辑 郭沂纹
特约编辑 李易蓉
责任校对 修广平
封面设计 回归线视觉传达
技术编辑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28 插 页 2

字 数 453 千字

定 价 51.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浙江省社科联省级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资金资助出版

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重点学科暨创新团队资助出版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关于牛李党争的几个基本问题	(16)
第一节 牛李党争起因刍议	(16)
第二节 党派分野和党争动力机制	(30)
一 党派分野的依据	(30)
二 党派分野动态结构	(45)
三 党争动力机制	(57)
第二章 牛李党争的演进历程	(60)
第一节 从前期党争模式向牛李党争模式的演变	(61)
一 前期党争中几个党争漩涡的考察	(61)
二 从前期党争模式向牛李党争模式的演变	(72)
第二节 文宗朝：互为胶着、互为进退时期	(79)
第三节 从会昌朝至大中朝：一党独制的阶段 以及党争的结束	(102)
一 会昌大中朝相权的演变轨迹：从“常令 政事出于中书”至“愿相公无权”	(102)
二 会昌朝政绩的缔造	(110)
三 会昌大中之际党争的白热化以及党争的结束和余波	(127)
第三章 党争的产物：一种具有攻击倾向的文学作品	(161)

第一节 早期党争中产生的“攻击型”传奇作品·····	(162)
一 作为爱情悲剧和“攻击型”传奇作品的 《霍小玉传》·····	(162)
二 《李娃传》主副调互补的叙述策略及其 间接攻击策略·····	(170)
第二节 李党攻击牛党的系列作品探析·····	(178)
一 绯衣小儿和两角犊子——对图谶的利用·····	(178)
二 政治形势的变化与匿名、易名的攻击策略·····	(185)
三 李党攻击牛僧孺的力作——《周秦行纪》·····	(190)
第四章 牛李党争与文士 ·····	(196)
第一节 李德裕贬死崖州与文士心态·····	(196)
第二节 从党派分野动态结构的角度来考察 党争和文士的关系·····	(207)
第三节 杜牧与牛李党争·····	(231)
一 杜牧之为牛党辩·····	(231)
二 从边缘层向紧密层的摆动·····	(238)
第四节 李商隐与牛李党争·····	(256)
一 李商隐在党争风波之中·····	(258)
二 大中朝李商隐之行迹与心迹·····	(282)
三 从经验模式角度看党局牵连与义山 无题诗之关系·····	(295)
第五章 牛李党争与中晚唐政治文化及晚唐诗风 ·····	(317)
第一节 作为中晚唐政治腐败之表征的 牛李党争·····	(317)
第二节 牛李党争与中晚唐政治格局、政治 文化的嬗变·····	(325)
一 牛李党争与中晚唐政治格局的嬗变·····	(325)
二 牛李党争与中晚唐政治文化的变迁·····	(326)
第三节 牛李党争与晚唐诗风·····	(331)

一	按照中晚唐政治文化的嬗变轨迹对晚唐文学 发展作出分期与阶段划分·····	(331)
二	牛李党争参与塑造了晚唐政治文化从而参与 塑造了晚唐诗风·····	(334)
余 论	从牛李党争到白马之祸:怨恨积聚的晚唐 社会和充满怨恨的文士·····	(372)
第一节	牛李党争时代文士的怨恨·····	(373)
一	永贞元和之际尚不足以形成“怨恨”心态·····	(373)
二	牛李党争时期怨恨心态之特征及其初步形成·····	(375)
第二节	唐末文士的怨恨·····	(377)
第三节	怨恨的晚唐社会与艳情、隐逸的风习 ·····	(390)
一	沉迷于艳情世界·····	(392)
二	唐末隐逸之路·····	(404)
参考文献	·····	(422)
后记	·····	(438)

绪 论

一

观目前晚唐文学研究之概况，虽研究情况有所改善，取得成就不菲^①，然以“历史文化综合研究”之方法对晚唐文学进行全面观照之著作则不多见。古代封建社会，政治关系文学甚巨，欲阐明晚唐文学之特质，不能不明当时政治、政治文化之概貌也。此吾所以以当时政治、政治文化为切入点，而对晚唐文学展开总体研究之故也。而发生在中晚唐政坛上一大事件即牛李党争，很多文士卷入党争之中，党争影响其诗文创作甚巨，予乃复以此为切入口，推演中晚唐政治格局、政治文化之嬗变，进而考察文士之政治命运，又进而考察晚唐文学之特征。初欲以晚唐文学为研究之范围，然中晚唐文学自是连成一片，莫能割舍，乃以晚唐文学为据点，上溯中唐文学，合而综论之，由此乃有《牛李党争与中晚唐文学》一书。此选题之基本思路也。

就晚唐政治与文学这个课题来看，目前学界这方面的专著尚阙，已有的研究或侧重于政治，或侧重于文学，但很少有人能够真正把文学与政治联系起来，找到它们之间的关系。因此，这些研究也就很难回答这个问题：政治是如何具体地影响到中晚唐文学，如何影响到文士的政治命运和文学创作的？

就牛李党争与文学这个课题研究看，同样也存在着或侧重于政治或侧重

^① 参见陶庆梅：《新时期晚唐文学研究综述》，《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4期；杜晓勤：《隋唐五代文学研究·晚唐文学研究》，北京出版社2001年版。

于文学的现象,以及其他缺陷。下面将针对这个问题进行陈述,以便在研究的时候汲取其精华,避免其缺陷。

首述侧重政治而薄于文学者。

古今论牛李党争者众矣。陈寅恪、岑仲勉二先生奠定了近世牛李党争研究之格局,扬波于前,傅璇琮、周建国、王炎平诸先生又从而阐扬之,推浪于后,故有关牛李党争之专著、论文层出不穷,颇为可观。陈寅恪先生撰《唐代政治史论稿》^①,认为李党是重门第的“山东士族”集团,牛党是重科举的“新兴阶级”集团,在这种党派分野观念的基础上论述了党争的性质、起缘、过程。岑仲勉先生针对陈寅恪先生的观点,提出“李德裕无党”之说,以实证主义研究方法辨析了党争的一些基本事实,如“牛党”、“李党”的名称,元和三年(808年)对策案是否是党争的起缘等。此后大陆和海外学者围绕二家说法,各自立论,自出新见,一些对立的观念争论得十分激烈,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与其说看不到有归同的趋向,倒不如说目前还处于一种混沌状态”^②。欲知牛李党争研究之现状,可观如下几篇综述:〔日〕渡边孝《牛李党争研究的现状与展望》,张国刚《隋唐五代史研究概要》(天津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牛李党争部分概述,周建国《李德裕与牛李党争考述》(见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5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这些专著和文章基本上侧重对牛李党争作纯粹的历史研究,对文学方面基本上忽略了,即使提及,也是几笔带过。

20世纪80年代牛李党争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是傅璇琮先生的《李德裕年谱》(齐鲁书社1984年版),该书汲取前人研究成果,坚持是非牛的原则,在广泛占有史料的基础上,认真辨析党争史料之真伪,全书深入地细致地考察了牛李党争的经过、性质和是非曲直,对中晚唐文学研究甚有助益。

周建国在《论牛李党争与中晚唐文学(兼评〈李德裕年谱〉)》(《文学遗产》1987年第3期)中评价该书贡献指出两点:“一、《年谱》是中晚唐文学的历史记录。二、《年谱》是中晚唐历史的文学反映。”“《年谱》通过谱叙李

① 重庆商务印书馆1944年初版,今用上海古籍书店1997年版。

② 〔日〕渡边孝:《牛李党争研究的现状与展望》,《中国史研究动态》1997年第5期。

德裕与这些人物的关系为读者展示了一个中晚唐文学家之间有机联系的立体空间。如果能立体地看问题,我们对当前学术界有关争议的问题就可能比原先看得深”,这使我们觉得有必要突破传谱之体例,进一步更加开阔地展示牛李党争与中晚唐文学的关系之必要性。因为“牛李党争与中晚唐文学的关系涉及甚广,其包括着纵向的史的研究及横向的历史文化总背景下作家作品的研究”,然而由于专著性质的限制,更多侧重于政治事件的梳理,对牛李党争和当时文学的具体关系,对文士的诗文作品本身,则尚未来得及展开阐述。

次述侧重文学而薄于政治者。

新时期以来,对于晚唐文学的研究逐步深入,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从社会文化角度来综论晚唐文学的专著和文章,如:余恕诚《晚唐两大诗人群落及其风貌特征》(《唐诗风貌》,安徽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康萍《唐末诗歌的淡泊情思及其原因》(《复旦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吴在庆《中晚唐苦吟之风及其成因初探》(《中州学刊》1996年第6期)、许总《论唐末社会心理及诗风走向》(《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1期),等等;但是晚唐社会文化背景(包括牛李党争)仅仅作为具体的文学现象阐释的后景甚至远景,被浮光掠影、蜻蜓点水地论及,使人有意犹未尽之感。

次述虽论述牛李党争与文学之关系,然仅针对某个人物或者某本专著,而基本上尚未展开综合论述者。

一些学者已经认识到牛李党争对中晚唐文学的影响,而且也从党争的角度去研究中晚唐的一些重要诗人,如白居易、刘禹锡、李商隐、杜牧、温庭筠等。

缪钺、吴在庆、寇养厚、王西平、任晖、朱碧莲、凌文生等人研究了杜牧与牛李党争的关系^①;

刘智亭、王载源、刘修明、周建国、傅璇琮等人研究了李商隐与牛李党

^① 缪钺:《杜牧年谱》,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吴在庆:《杜牧论稿》,厦门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寇养厚:《杜牧与牛李党争》,《文史哲》1988年第4期;王西平:《杜牧与牛李党争》,《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4期;任晖:《杜牧与牛李党争》,《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朱碧莲:《论杜牧与牛李党争》,《文学遗产》1989年第2期;凌文生:《杜牧与牛李党争》,《苏州铁道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第2期。

争的关系^①；

朱金城、周建国、魏昌和段崇俊等研究了白居易与牛李党争的关系^②；

吴汝煜、卞孝萱等研究了刘禹锡与牛李党争的关系^③；

卞孝萱还研究了唐传奇、笔记小说与党争的关系^④。

当然，在其他专著里，有关党争与这些著名文士之关系的论述则更多了，兹不赘举。

这些专题的研究为我们研究牛李党争与中晚唐文学的关系进而综合研究中晚唐政治与文学的关系奠定了基础，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末述虽已对牛李党争与文学进行专题论述，然我们未必不可以重新诠释这一事件与文学之关系者。

据我目前所知，台湾学者傅锡壬先生的《牛李党争与唐代文学》（东大图书公司，中华民国七十三年九月初版）一书或许是仅见的全面讨论牛李党争与文学之关系的专著。据其自序，他选择牛李党争与文学这个课题的原因是：“藉着历史与文学相互交错的某些现象中，窥见了当代历史的真相，或透析了文学的表层，探触到了和人类接触更广泛的文化意义。”并且认为“历史与文学的整合性研究，是未来必须走的一条路”。此与大陆上历史文化综合研究之潮流可谓不谋而合。该书是在陈寅恪党派分野的观念上展开论述的，而且认为李党多系山东贵族，而牛党多系关陇贵族。此书共分为四章，第一章探讨了牛李党争的始末，第二章辨别了党争的有关史料，第三章和第四章分别探讨了党争与文学、党争与文士的关系，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阐释体

① 刘智亭：《李商隐与牛李党争》，《陕西师大学报》1985年第4期；王载源：《牛李党争与李商隐的倾向》，《中州学刊》1986年第2期；刘修明：《牛李党争和李商隐的〈无题〉诗》，《史林》1995年第4期；周建国：《试论李商隐与牛李党争》，《文学评论丛刊》1984年第22期；傅璇琮：《李商隐研究中的一些问题》，《文学评论》1982年第3期。

② 朱金城：《白居易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周建国：《白居易与中晚唐的党争》，《文献》1994年第4期；魏昌、段崇俊：《牛李党争与白居易诗歌创作》，《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3期。

③ 吴汝煜：《刘禹锡传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卞孝萱：《刘禹锡年谱》，中华书局1963年版；卞孝萱、卞敏：《刘禹锡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④ 《唐小说集〈玉泉子〉的政治倾向》，《南通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3期；《〈戎幕闲谈〉新谈》，《西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唐代小说与政治》，《中华文史论丛》1985年第1辑；《唐传奇新探》，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系。其中很多观念，跟大陆的学者有很多不同的地方，比如，其党派分野的理论就不无可以商榷之处，其观点接近于大陆学者李浩的观点，然另一位学者王力平先生则对此作出反驳^①。参照其他学者对牛李党争问题的研究，重新诠释牛李党争与文学之关系，写出与此书面貌颇异的论著，也并不是不可行的，此亦唐李商隐“愚与周孔俱身之”（《樊南文集》卷8《上崔华州书》）之意，学术之路本来允许多样化的探索。

二

传统文学研究虽然十分注重政治与文学的关系，但是这种研究的缺陷也是十分明显的，其具体表现在：1. 在研究选题的取舍标准上过于注重作家作品的思想价值，集中研究重要作家，而忽视了大量的二三流作家以及他们的更加直接地反映时代风气的作品^②；2. 往往沿袭注重于重大历史事件对文学的影响这一既成思路；3. 把社会政治变动直接跟文学创作对应起来，认为文学像一面镜子一样直接地反映社会历史现状，这是反映论的方法。从而，我们认为有必要重新审视政治与文学的关系，汲取学界文学文化学、社会学研究的成功经验，尽量避免这些研究的缺陷。

那么，政治与文学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呢？最重要的是找到二者之间的中介将二者联结起来。余恕诚在《唐诗风貌·弁言》（安徽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中提出了中介的寻找，“努力在诗歌风貌与社会生活之间，探寻其中介，对社会的文化背景、时代心理、诗人的情感体验予以注意”。这种观念打破了传统的仅仅考察重大历史事件对文学的影响这一既定思路，要求在宏观的社会背景（政治）与具体的文学现象之间用一些具体的环节将之联结起来。

本书将以中晚唐政治文化和文士的政治命运为中介，将政治、文人、文学三者联系起来，通过对政治与文学之间一些因素和环节的梳理，形成政治与文学互动的理论。政治格局、社会力量的变化，通过文人的政治命运和生

^① 参见本书第一章《牛李党争起缘、党派分野、党争动力机制》第二节“党派分野”。

^② 该理论参见〔美〕阿瑟·O. 洛夫乔伊：《存在的大链条》；〔英〕拉曼·塞尔登编《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60—462页。

存境遇而形成了一定的政治文化和其他价值观念，并塑造了这个时期文学艺术的精神特质和艺术风格。

（一）政治文化的定义

政治文化的定义有狭义和广义之分，本论文取狭义的定义。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由本民族的历史和当代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进程所促成。它的隐含前提是人们在过去的经历中形成的态度类型对未来的政治行为有着不可忽视的强制作用^①。

（二）政治事件和政治文化的互动

按照年鉴学派—新史学派的观点，政治事件属于短时段的历史，而政治文化是属于长时段的历史。这两者并不是互不相干的。短时段的因素，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转化为某种长时段的因素，某些重大的具有特别意义的政治事件也能产生长时段的深刻影响，即对政治文化产生冲击和调整，由过去形成的某种人类行为的基本特征，这种行为即使在其所由产生的客观条件已经消失的情况下，仍旧依靠某种“心态结构的情况”而苟延下去^②。举个例子来看，比如甘露之变事件，由宦官操持的恐怖性大屠杀，对于中唐以来士人奋厉当世之事的政治文化无疑产生了重大的冲击和影响，以致当时很多的士人开始形成了一种避祸全身的政治文化，从而成为晚唐政治文化的总体特征。同时，政治文化也不是被动的，而是反作用于当时的政治形势和政治事件，并产生直接的影响。可以这样说，晚唐政治本身就是当时人的政治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

^① 有关政治文化的理论，请参见[美]加布里埃尔·A. 阿尔蒙德和维巴：《公民文化——五国的政治态度与民主》，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美]加布里埃尔·A. 阿尔蒙德：《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孔德元：《政治社会学导论》，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王乐理：《政治文化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毛寿龙：《政治社会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王卓君：《文化视野中的政治系统——政治文化研究引论》，东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② 参见高毅：《法兰西风格：大革命的政治文化·绪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44页。

（三）由一定的政治文化如何影响到文人的文学创作

文人主导性的政治认知、情感和评价，将直接影响到他们的文学创作。以奋厉当世之事为政治文化主导观念的文人，会写出更多更直接的讽喻时事的作品，而以独善其身为政治文化主导观念的文人则有可能消解了对政治的关注和热情，而沉迷于艳情、隐逸、景物之中。

（四）政治与文学互动的理论

我初步作了一定的梳理，认为在政治和文学之间实际上有着这样的一些因素和环节：1. 处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的政治（政治事件和政治环境）；2. 文人的政治命运和生存境遇；3. 由这种政治、文人的政治命运与其他因素一起形成一定的政治文化和其他价值观念；4. 由此而形成的一些文学现象（包括文学潮流、文学样式、文学群体等）；5. 个体的文学创作。这些因素和环节处在一个互动的过程中，正是通过这种互动，才使政治跟文学联系在一起，才可以使我们通过政治来谈文学，我们才可以说“没有多少晚唐文人能避开政治”。

第一步，处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的政治，是由当时的经济、文化、社会心理诸因素综合决定的，并由社会经济的总规律最后决定。经济对政治的决定这个层面，在本书里基本上不谈，这是为了突出重点，避免枝蔓。但是政治文化对政治的影响本文将会重点谈到。因为政治事件作为短时段的历史，一方面固然不一定会改变政治文化的本质结构，但是另一方面，会对原有的政治文化产生冲击，使之作出调整 and 变化；而这种变化了的政治文化反过来又会影响到政治事件、政治氛围和政治进程。

第二步，政治环境和政治事件是通过什么环节而形成一定的政治文化的？这就是通过文人的政治命运和生存境遇。固然，处在权力中心或直接有从政经验的文人，他们的政治命运显得更加直接一些，但是实际上，几乎所有的文人都处在一定的政治环境和政治氛围之中，即使他们避开和疏远政治，这本身也是一种政治行为（如果从广义的政治来看）。对于文人的政治命运和生存境遇方面，笔者至少要注意到这么一些方面：1. 文人跟政治权力的关系。他们是处在政治权力中心还是边缘，这对他们的生存境遇、心态和文学创作都会产生相应的影响；2. 一定的具体的政治事件中文人的处境

是怎样的？在考察这个政治事件的时候，将更加注意政治事件前后权力结构的变化和士人的社会地位的升降；3. 处在一定的政治环境中的士人阶层的变化，其社会政治、经济地位的变化，比如，晚唐士族和庶族的地位的升降，这要求从阶层的层面上来把握士人群体。

第三步，由这种政治、文人的政治命运与其他因素一起所形成的一定的政治文化和其他价值观念。一定的政治文化本身，一方面，既是一定的政治传统的产物，另一方面，也会随着政治环境的推移和重大政治事件的冲击而发生相应的变化。在考察晚唐文人的政治文化和社会心态的时候，本人将抓住几对主要的矛盾和关系：1. 道统和政统的矛盾；2. 仕与隐的矛盾；3. 个体主体和群体主体的矛盾，等等。

第四步，由此而产生了一些文学现象（包括文学潮流、文学样式、文学主题等），形成了各种文学群体。某种文学思潮和文学流派的形成，是通过一定的文学价值观念为中介的。而这种文学价值观念本身就是从一定的经济、政治、文化的总体环境中生长起来的，其中政治文化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晚唐文学具有明显的不同于盛唐文学和中唐文学的特征，就其文学的价值取向来看，具有内倾性的文学思想、文学主题和文学样式占据了当时文学主流，这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其具体的文化背景的，是士人政治心态和社会心态的一种直接表现。以表现个体的内心世界的文学观念基本上占了上风，出现了隐逸诗风、艳情诗风、朦胧诗风和苦吟诗风，当然也盛行着愤世诗风，这是对不公正的政治体制无奈和激愤的抗争。就其文学体式来看，诗歌以近体律绝为主，骈文复归的潮流中出现了抒情小赋，寓言体的小品文大为流行，传奇志怪的创作进一步衰落，词作为一种新兴的文体正在兴起，从某个角度来说，这些文学形式未必不是晚唐社会环境的一种必然产物，是一种经济政治文化的转喻，与士人的心态正好具有一种微妙的对应性。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作为具有一定的人文关怀精神的文人即使在险恶的政治环境和衰微的时代中也并不能全然忘怀于国家、民族和人民，所以即使在晚唐这个衰落的时代，还是出现了一股反思社会现实，呼吁社会正义的思潮，并在其文学创作中表现出来。

第五步，最后落实到个体的文学创作。个体文人往往是某个文学群体中的一员，他的文学创作就不能不受到这种文学思潮、文学流派和文学时尚的影响，从个体的文学作品中往往可以窥探当时的某种文学价值取向。同时，

必须注意到文学作品并不是空洞无物的形式制品，而是一种意识形态要素和艺术形式的结构构成物，当然，这种意识形态要素也要经过个体的文学价值观念的选择和过滤才能最后成为文学作品的结构成分。

在讲到社会环境对于个体的文学创作产生影响和制约的同时，也不应该忽视文人本身也是具有一定的主观能动性的主体，他们本身就是社会生活 and 政治生活的参与者和当事人，他们的主观选择和客观实践对经济政治文化起着反作用和推动作用。不同的文人即使处在完全相同的政治经济环境中，他们的文学创作还会有所不同，甚至刚好相互对立，这就必须从文人的社会文化心理结构和他的性格结构来探求原因。所以，在谈到经济政治、社会心理、文学现象对于个体的文学创作的影响和制约的同时，也不应该忽略作为有一定的主观承受性和主观选择性的文人主体的自身原因。如果有可能，我将注意到这么一些因素：比如文人的知识学背景、在地域背景和文化背景上形成的一种文化传统、人生已有的经验和记忆、对于时代氛围和潮流的感应、审美意识和审美心理、性格气质，等等。

以上的理论设想主要是使我们在考察牛李党争和文学关系的时候，不将两者的关系简单化，一副庸俗社会学的面孔。在研究晚唐文学的时候，至少不孤立地谈审美，而是将之放到一个复杂的、丰富的历史社会语境中去。当然如果要真正落实这个理论设想，却也不是容易的事情。我只能尽我所能，在摸索中逐步调整步伐，寻找最佳的切入点，以便对牛李党争与中晚唐文学作出合理的理解和阐释。

三

本书围绕着牛李党争、文人、文学三者之间的关系展开论述。在政治与文学互动理论的基础上，阐述三大部分的内容：1. 牛李党争的性质、特征以及发展历程（政治部分）；2. 牛李党争对文士的政治命运和生存境遇的影响从而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主体部分）；3. 中晚唐政治格局、中晚唐政治文化的嬗变与晚唐诗风的形成（创作部分）。

本书的主要内容和主要观点梳理如下：

第一章分两节，论述牛李党争的几个基本问题。

第一节述牛李党争起因。

本书将元和三年（808年）对策案作为牛李党争的起因。本书按照陈寅恪先生的观念，即认为元和朝内朝宦官分为两派且与外廷朝臣互为进退，在文史学家已有研究成果之上，将元和三年（808年）对策案分为两个阶段来考察，从而得出：由于宦官和裴均的构陷，人事上的矛盾，李吉甫与牛李之间间接产生纠葛。同时本文也指出：我们既要看到元和三年对策案在牛李党争史上的地位，更应该看到只有长庆元年科场覆试案才是真正使牛李两党分裂为两大对立集团的标志性事件。

第二节 述党派分野和党争动力机制。

（一）本书吸收陈寅恪先生党派分野理论的合理内核，认为陈寅恪先生的党派分野理论其实是一种“政治文化决定论”，而非出自出身决定论。在忽略牛李两党出自出身对立的基础上，本文提出：牛李党争是统治阶级内部两大不同的政治亚文化之争。

（二）接着本文按照党人归属的客观规定性和主观自主性两方面兼顾的原则，提出党派分野三大依据。1. 出自出身和政治文化的自我认同；2. 政治观念；3. 人际关系的两个方面和时人的眼光。这种党派分野理论进一步突出了政治文化的自我抉择、自我认同对党人归属所起的作用。

（三）从总体上看，党派分野具有从中心向边缘扩散的特征，本文依据士人卷入党争的程度、与党争距离的远近，而划分了五个层次，形成了党派分野动态结构理论，依次考察了处在不同层次的士人与党争的关系及其生存形态，对不同层次之间的相互交融、相互移动的现象作出说明。最后对外围层中立派的各种不同形态作出考察，以便反过来更深入理解当时士人被卷入党争的广泛性、深入性。

（四）本书认为，至少有四项因素可以构成党争动力机制的要素：1. 权力与利益之争；2. 政治文化之争；3. 政见之争；4. 意气之争。不同的党争事件，往往突出的是党争动力因素的某个层面，或者几个层面，或者必须从完整的党争动力机制的角度来理解某个事件。从党争作为一个动态过程来看，越到后期，意气之争的成分也越严重。

第二章分三节，论述牛李党争的演进历程。

第一节 述从前期党争模式向牛李党争模式的演变。

元和末长庆宝历年间，以李逢吉为首的党派与李宗闵、牛僧孺为首的党派组合成一个普泛的同盟，与以李吉甫、裴度、李绅、李德裕为首的党派之